

| 第三章 |

自强新政:晚清改革的成效与失败

一、洋务派与洋务思潮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遭受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下，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认识到清军武器的落后和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及武备的活动。此项活动的中心，60年代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为主；70年代后，在进行上述活动同时，还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从事这些活动的官绅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主张和领导洋务运动的官僚，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户部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左宗棠（闽浙、陕甘总督）、张之洞（两广、湖广总督）等为代表，他们大多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中起家的汉族官僚；并多受经世思想影响，以挽救清王朝的危机为己任。二是一批鼓吹和支持洋务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容闳、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随着洋务派的产生，一股旨在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也在兴起，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



|| 李鸿章像

两个方面：

（1）倡“古今之变局”论，主张借法自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潜流。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极大地变化，洋务派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将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心联

属之天下”^①，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何应付这种变局？洋务派主张因时变通、顺应世变。他们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②洋务派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已逐渐从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来审察近代中国的发展，主张中国应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

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认为除华夏之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这实际是一种狭隘封闭的世界观。洋务派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确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冯桂芬说，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③，因此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采西学”、“制洋器”。李鸿章则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④总之，“借法自强”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出发点。

（2）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顽固派采取了一概拒斥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辩”；相比之下，洋务派则较为开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不可变的。西学，即西方的生产技艺，可以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1861年，冯桂芬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稍后，王韬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⑤还进一步论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⑥郑观应也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⑦就是从事洋务的官僚也有类似的探讨。1865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5号，第2519页。

③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④ 李鸿章：《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⑤ 王韬：《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⑥ 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

⑦ 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①较早把中学西学关系作明确概括的，是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沈寿康。他在1895年写的《救时策》一文中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②而比较系统地阐发此思想的则是张之洞。1898年他作《劝学篇》，提出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③

“中体西用”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第一个阶段产生的，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初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华夏中心”的意识，并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氛围里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洋务派讲中体西用，是想在不变“本”——封建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枝芽”。这是“中体西用”的实质，它也必然会带来不可克服的矛盾。严复就批判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④

二、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和新式陆海军的建立

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梦是从“求强”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以建立军事工业为重点的近代洋务企业兴办的第一阶段。

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开始，到1890年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先后创办了21个规模不等的军事工业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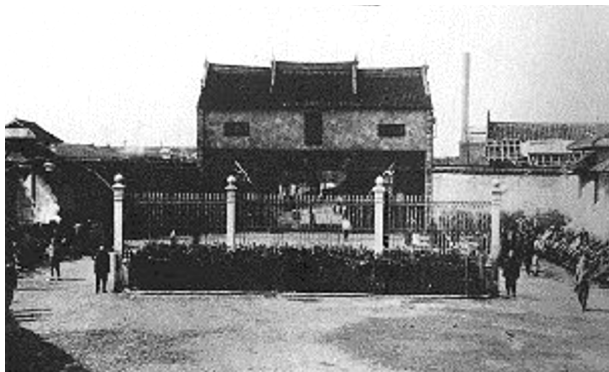
1865年李鸿章责成江海关道丁日昌出面，收买设立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并将上海、苏州两炮局和容闳订购的机器并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沪局。局址最初在上海虹口，1867年迁到城西南的高昌庙新址。成为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到1893年，共建成机器厂、汽炉厂、无烟火药厂等16个分

①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1号，第324页。

② 《万国公报》（上海）第75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

③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三》，冯天瑜、肖川点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④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大门

厂。到1890年，职工达2 913人，房屋有1 974间，全厂有大小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662台，大小蒸汽动力机361台，大小汽炉30座，总马力达6 138匹。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不仅制造各种枪炮、水雷、弹药，而且设有轮船厂、船坞和炼钢厂，能制造兵轮和有关钢材，这是其他各制造局所不能相比的。当时外国人办的《北

华捷报》曾惊奇地指出：“真没有预料到它（指沪局）后来在历任两江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①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经费为54.3万两，常经费每年约计五六十万两。该厂技术、设备依赖外国人，其产品多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到1885年，其制造大小兵船15艘，此后停止制造，专修南北洋各省船只。该局于1868年附设翻译局，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人合译西书，并选拔聪颖子弟入馆学习，造就机械工程师。

在江南制造局成立的同一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1863年设立）迁往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该局虽然规模、经营上远不如沪局，但也是洋务派办得较早较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到1879年，它已形成三个机器厂，翻砂、熟铁、木作各二厂，包括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的炮台机器局等在內的兵工厂。后来又曾两次进行扩充，增设了一个洋火药局，并增购50多台制造枪炮子弹所必需的机器。所购机器设备主要来自英国，间或也有购自德国和瑞士的，主要工程师和负责人是英国海军军医马格里。据两江总督刘坤一估计，“宁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万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万粒。”^②

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又叫马尾船政局，它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楨接办。福州船政局有船台转锯厂、大机器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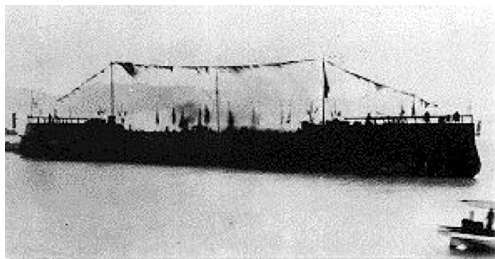
① 孙毓棠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页。

② 《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7~58页。

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等，经常雇用工人约1 700到2 000人。初期聘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还聘用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为了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该局附设了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学堂习英文，主要培养驾轮船的人才，后来又添设“艺圃”以培养技工。从1869年铁厂开工到1874年的五年中，共制造轮船15只，但都是木质（木肋）轮船，轮机不过150匹马力。1875年船政局按约辞退大批外国技师、工匠，技术设计改由船政局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其所造轮船也由木肋船改为铁肋船。1877年，第一艘铁肋兵船“威远号”下水；1882年第一艘铁肋巡洋舰“开济号”（载重2 200吨，马力2 400匹）下水，反映福州船政局造船技术与工艺的逐渐提高。可惜的是，福州船政局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遭到极大的破坏。



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



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



湖北兵工厂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军火机器局”，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为“天津机器局”，1895年后又改称“北洋机器局”。李鸿章接办后，陆续增建了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成为“洋军火之总汇”。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枪支、子弹和弹药。最初以英人密妥士为总管，聘请英国技师，生产的军火主要供给淮军。从1870年李鸿章接办到1882年，共生产各式洋火药610万磅，枪子167万颗，炮弹40余万枚，铜帽29 746万颗，大小水雷地雷约3 000具。除制造新式军火外，还承修兵船、轮船与挖河机器船等，雇用工人两千余人，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被李鸿章视为淮系军阀的命根子。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该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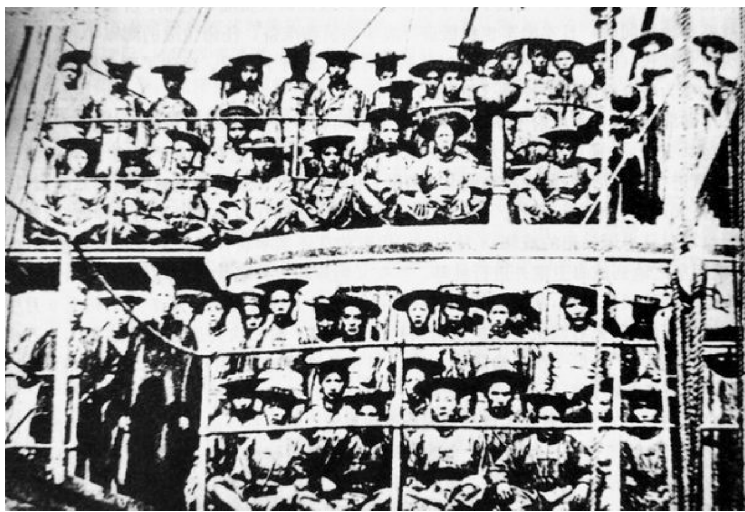
洋务运动后期，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于1890年在汉阳创建枪炮厂。该厂

有炮架、炮弹枪弹等分厂，机器设备购自德国，是当时设备最新的军事企业。但由于张之洞将经费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汉阳铁厂，所以直到1893年才初步建成。

除上述几个大的机器制造局外，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省份也陆续建立兵工厂。1895年中日战争后，除广西外，各省都建立了机器局。这些企业所采用的机器设备是从国外购进的，雇用了大量工人，按西方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从其生产关系来看已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同时，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培养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和少数科技人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但由于这些军工企业的主管人员多为官吏，他们不仅没有专业知识，还把官场习气带入企业，致使企业官僚衙门习气严重，营私舞弊与贪污中饱现象成风，经营管理腐败落后。生产的船只、枪械、弹药等质量不高，难以充当御侮之用。

19世纪60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普遍认识到革新旧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从1861年起，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为主要内容的活动。1862年，奕訢在天津组建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八旗兵到天津训练。湘军、淮军也大量采用西式枪炮。1865年起，淮军“尽弃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成洋枪队”，全部用西式武器和阵法，人员也从6 000增到5万多，成为武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1866年，奕訢在直隶又选练了一支1.5万人的军队，称“练军”。



|| 北洋舰队部分官兵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震动了朝廷中的部分官僚。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主张建立北、东、南三支舰队。187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并向英、德等国购船。到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其中北洋海军是规模最大的一支，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节制，防卫山东、直隶、奉天海域，有大小舰船15艘，大部分购自国外。南洋海军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节制，防卫江浙海域，拥有船舰19艘，主要是福州船政局、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福建海军由闽浙总督节制，防卫福建、台湾海域，有船舰11艘，均为福州船政局建造。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成军。

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海军指挥权，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李鸿章等为会办大臣，但实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李鸿章趁机加快北洋海军的发展，修建了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还从德国购进了定远、镇远两艘7000多吨的铁甲舰。到1888年正式成军时，北洋海军已拥有大小船舰25艘。但从1888年以后，为讨慈禧太后欢心，奕譞将大量海军经费挪用去修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发展停滞。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海军衙门也于1895年裁撤。随着北洋海军的失败，清政府已无海军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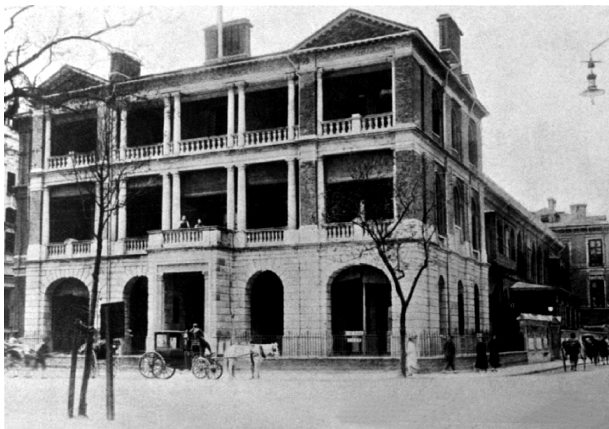
三、洋务民用企业与商办企业的产生

军事工业完全依靠官款，给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也得以产生和发展。第一，军用工业发展的影响和需要。洋务派创办军用工业后，遇到了诸多实际问题。军工需要大量的原料和燃料，而旧式交通运输工业难以适应运输军用工业的原料、燃料、产品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采掘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第二，受到外资工业的刺激和影响。军用工业耗费了大量的资财，经费颇显困难，而当时在华各种外资企业获利又十分丰厚，生产效率较高，刺激了国人。为了辟利源，裕经费，洋务派希望通过发展民用工业来开辟利源。第三，洋务派通过多年对军工企业的苦心经营，已在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为发展民用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提出“寓富于强”的口号，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一般分为三种经营形式，即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主要是依据经营管理权与资本所有权的不同来划分的。

所谓官办，就是由官方出资经营；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来经营管理，但在筹办时一般先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作为资金，等商股募足后再陆续归还。官督商办企业享有减税、免税、贷款和专利等特权，其盈亏全归商人承担。所谓官商合办，就是由官、商各出部分资金，而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则操纵在官方手中。

7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当时比较重要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基本上是官督商办企业。下面分别从行业的角度进行介绍。



■ 轮船招商局旧址

交通运输业，包括轮船、铁路、电报、邮政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下游内河航运，我国旧式航运业面临破产。1872年，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建立轮船招商局，这是规模最大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局。其规模日渐扩大，从最初只

有轮船3只发展到1877年有轮船30只。英商怡和、太古两行采取跌价等方式进行排挤打击，企图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在洋务派支持下敢于同外轮公司进行竞争，曾把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创办的美国旗昌公司挤垮，但也付出极大代价。由于外国轮船的不断竞争和排挤，招商局的业务曾一度停顿，中法战争期间经马建忠之手将招商局暂时售给旗昌洋行。1885年又收回局产，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进行整顿经营。

铁路的建设也已初步开始。开平矿务局成立后，1881年中国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揭开了中国陆路交通的新时代。1886年成立我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1893年唐胥铁路扩建至天津和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在台湾，刘铭传修建了基隆—台北—新竹铁路。1895年全国铁路长360多公里。

电报业也是洋务运动中较有成效的行业之一。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下，架设了一条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到天

天津之间长约40英里的电线，并于当年6月开始使用。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业人才，同时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随后在江苏、上海、镇江、大沽、济宁、清江浦等处设立分局。架设从天津到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1881年4月开始，11月竣工，全长2500公里。1882年电报局又架设通往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线路。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从上海架线到武汉，从广东发展到广西，从天津发展到东北三省，到1885年沿江沿海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截至1894年，洋务派架设的电报线共44条。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促进了我国通讯事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邮政始于1878年，当年3月9日，李鸿章派英人德瑾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天津、北京、上海、烟台、牛庄等地，仿照西法试办邮政，由海关负责主持。当时我国民智未开，商民对此不大信任，大量的邮件还是通过民信局递送。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改驿站为邮政，建立台湾邮政总局。我国邮政逐渐向近代化方向发展。

我国近代矿业的开办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洋务派军事工业和轮船航运的需要，并摆脱原来对洋煤的依赖，杜绝洋人的凯觞，开辟利源。从1875年李鸿章筹划磁州煤矿开始到1895年中日战争时止，我国先后兴办了大小16座新式煤矿，较为重要的有台湾的基隆煤矿、直隶的开平煤矿等。

台湾的基隆煤矿是我国第一座近代煤矿，年产量达5400吨，1875年沈葆楨奏请开办。次年成立台湾矿务局，派叶文澜为矿务督办。中法战争期间，在法军的威胁下，基隆煤矿遭到破坏，战后才得以恢复。刘铭传曾一度将其改为官办，但亏损也逐渐严重，1890年又一度移交商办，两年后因亏损而停止生产。1894年台湾沦陷后为日本侵略者所攫夺。

开平煤矿在洋务派开办的煤矿中最有成绩。轮船招商局成立后，用煤量大增，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筹建开平煤矿。采用官督商办，拟募集股本80万两，但商人愿募者极少，结果还是借领大量官款，买地建房，并向外国订购机器，按新法开采。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1881年开平煤矿开始产煤，日产量为五六百吨，到1894年增至1500吨，并迅速占领天津煤炭市场，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唐廷枢死后，由张翼接任总办，矿务局经营日渐腐败，大借外债，到1900年，英国侵略者利用八国联军入侵的机会，勾结张翼，通过欺骗讹诈手段，攫取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财产。

随着近代煤矿业的发展，机器开采也逐渐推广到其他金属矿业，加

上军用工业和其他工业对金属原料的迫切需要，金属矿的开采受到重视。洋务运动期间，我国先后组成金属矿公司或厂号达24家之多，其中铜矿8家，金矿6家，铅矿、银矿各4家，铁矿2家。^①在当时官、商各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是漠河金矿。该矿在同治初年已发现，由于俄国人不断越境偷挖金矿，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于是命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镛筹备开采。1888年开始用机器开采。开办初期，每年产量约值银12万两，1897年产量值银30多万两，拥有2 000多矿工。漠河金矿的创办带动了东北三省近代金矿的兴起。



张之洞像

钢铁及各种金属冶炼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冶炼业主要有贵州青溪铁厂和汉阳铁厂。青溪铁厂于1886年由贵州巡抚潘霁在贵州青溪县设立，潘霁以其讲求西学30余年、洞悉洋务的胞弟潘露筹办。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用近代方法冶炼钢铁的工厂。采购外国机器，建成八座高炉、两座炼钢炉，并有轧钢机设备。1890年正式投产，完全以西法冶炼，有盈无绌，颇有成效。直到潘霁病故后才暂时停工，1893年完全停办。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炼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决定兴建。张之洞

为了抵制洋铁入口，主张自炼钢铁以供应内地各省所需，于是成立湖北铁政局。该厂设在在汉阳大别山下，1893年底全部竣工，初为官办。铁厂包括6个大厂、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 000人。铁厂于1894年投产，但因燃料不足难以全部开工。由于张之洞等人对近代企业的管理不甚了解，因此经营成效不佳，刚开炉不到5个月，即停炉达10月之久。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洋务派走了一条先发展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的独特发展道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洋务派开始筹建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 and 湖北织布局等棉毛纺织业。兰州织呢局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1880年9月开始建厂，向德国泰来洋行订购成套机器设备400箱，次年3月开始投产，其经费全为官款，由于原料不足与销售困难，1884年5月为新任总督谭钟麟裁撤。兰州织呢局是我国近代纺织工业的翼祖，也是官办的最早一家轻工企业。

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由李鸿章奏准创办，是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1890年开始生产，每日夜

^① 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出布600匹，销路较畅，营业兴盛，利润较好。原因之一，是李鸿章在开办之前曾为织布局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这使其生产发展较快。不料在1893年10月织布局失火，厂房设备全部烧光。同年11月，李鸿章又令盛宣怀等人负责重建布局，招徕商股，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十个分厂，计有纱锭6.5万枚，布机750架，1894年9月部分投入生产。

湖北织布局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1893年在武昌门外临江地方建成厂房，开始投产。当时有纱锭3万枚、布机1 000张，每天出纱100担。1894年生产本色市布70 288匹，斜纹布5 970匹，棉纱4 413担。在湖北，张之洞还先后建立了纺纱、缫丝、制麻等局，并称为“纺织四局”。其中纺织局为官商合办，缫丝局为官督商办，制麻局为官办。这些企业都于1902年由商人承租接办。

洋务派所创办的民用企业，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官督商办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方式，对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企业，为中国私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承办人和管理者多为洋务派官僚所指派，企业的运行要服从洋务派官僚的意志，企业中的私人资本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企业内部任用私人、营私舞弊不断，最终造成效益低下、难以获得正常的发展的结果。

在洋务派创办军、民用工业的同时，19世纪60年代，一部分商人、官僚、地主、买办开始投资创办企业，这就是商办企业，也称民族资本企业。

其实，中国社会内部从明清时期开始，在棉纺织、冶炼等行业中，就已出现新经济因素，但在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难以正常地发展；尤其是清朝从康熙时开始推行的“闭关”政策，更是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和联系，使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实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陆续开办了一些近代企业。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和由此带来的优厚利润，无不对这一部分商人、官僚、地主、买办产生吸引和刺激作用。加上洋务企业的创办，也为他们投资近代企业提供了“榜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要求在中国开矿设厂、建铁路、架电线，引起国人的抗争，而各种外资企业侵蚀中国利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也引起国人的戒心，于是提出了“商战”、“稍分洋商之利”等口号。这些都推动了商办企业的产生。据统计，从60年代后期到甲午战争，先后创办了



■ 陈启源像

大约170家商办企业，主要分布在机器修造、缫丝、纺织、火柴、造纸、印刷、航运等行业中。

商办企业中，以机器缫丝业成效较著。最早创办起来的是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72年创设，有600余女工，使用蒸汽机生产，所产之丝精良，行销欧美，获利甚丰，带动了整个广东省缫丝业的发展。上海最早的华商缫丝厂是1882年浙江丝商黄佐卿创办的公和永丝厂。除公和永丝厂外，还有坤记（1884年）、裕慎（1890年）、延昌（1893年）、正和（1894年）、纶华（1894年）等华商丝厂。机器轧花业以1887年严信厚创办的宁波通久源轧花厂为最大，初建时有手摇轧花机40台，蒸汽轧花机12台，雇用工人三四百人。

在近代商办企业中，船舶机器修造业是发展最早的一个部门。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即出现了以修理轮船为主的陈联泰机器厂，除修理轮船外，它还制造缫丝机器等。上海最早的一家中国船厂是1858年广东籍买办甘章创设的甘章船厂。当时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是1866年广东香山方举赞、孙英德创办于上海虹口的发昌机器厂，其主要业务是为美商经营的船坞加工、打制零件。当时的机器厂，其业务一般以修理船舶、修造小火轮、打制修理船用零件为主。除上海的船舶修造业较为发展外，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的船舶修造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代火柴业也开始逐渐兴起，厦门、上海、天津、广州、太原、福州等地相继创办了一些小规模火柴厂。其中，兴办最早的是浙江慈溪火柴厂，规模较大的有1890年创办的上海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日产50大箱（每箱50大包）。近代机器造纸和印刷企业也同时在广州、上海等地出现。1882年，广州商人钟星溪在南海县创办了机器造纸厂，资本15万两。上海第一家近代造纸厂是李鸿章发起建立的伦章造纸厂，资本30万两。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建昭文新报，为我国机器印刷业之始。1882年广东人徐鸿复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采用机器石印技术，购备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较大。它影印的《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印刷精美，流传至今。后来又有李木斋的蜚英馆石印局、罗海龄的机器印刷厂相继创办。面粉业以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较为著名。该磨坊是1878年江苏宝山人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规模不大，但获利甚丰。上海、福州、北京等地也有机器面粉厂。

近代制药业也始于洋务运动时期。西药传入中国由来已久，但一直操之于外人之手。1887年，我国第一个中药房，即中西大药房在上海成立。此后其他药房也相继而兴，如中英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用事业中，有旧金山华侨黄秉常等人于1890年在广州开办的广州电灯公司，装用近700盏电灯。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订购了机器，办起电灯厂，在总督衙门安装了100盏电灯。上海、广州、汉口、沙市等地相继筹办自来水公司。

总之，甲午战争前的商办企业尚处于产生时期，它们主要分布在轻工业行业中，重工业非常少。这一时期商办企业的总资本约722.5万元，只有同时期外国资本的1/7；与本国官办资本相比，也只有它的1/4略多一点。这决定了这些商办企业大多规模小、设备简陋。处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力之下，商办企业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

四、近代教育的开始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教育制度大多沿袭明朝，中央设有国子监（中国最高学府）、旗学（满族学校）、宗学（贵胄学校），地方设有府、州、县学以及书院和私塾。这些学校都是围绕科举考试而进行的。

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主要表现在创办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生等方面。随着洋务活动的深入，洋务派深感外国语人才缺乏的难处，1861年初恭亲王奕訢等人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的主张，并于次年奏请设立同文馆，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京师同文馆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法、俄文三班，后来又于1867年在馆内设立算学馆，增设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成为一所培养外语和具有一定科学知识人才的学校。除京师同文馆



|| 京师同文馆

外，当时洋务派创办的外国语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同文馆、珲春俄文书院、台湾西学馆等。

新式装备与军队革新需要大量军事人才，洋务派大力创办近代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南京水师学

堂、南京陆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这些学校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诸如邓世昌、刘步蟾等。

近代工业对各种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大增，洋务派又创办了一系列技术学校，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附设采务工程学堂、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福州电气学塾、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注重实用性，注重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授，如外语、天文、地理、化学、数学、电磁学、天文学、航海术、热学、声学、光学等，使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结合，培养人才学有所用。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先后办了30余所学校，这些学校突破了传统教育仅仅围绕科举和脱离实际的局限，把西学引进课堂，着力培养面向实际的实用性人才。尽管在顽固势力的反对和社会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这些学校无不面临生源缺乏、经费困难、师资不足等问题，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文化，是近代教育开始的又一方面。国内虽然创办了一些近代学校，聘请了一些外国教习，但对人才的培养仍然不够，学生所学西学往往难得其要。在此情况下，清政府逐渐认识到派学生出洋学习的重要性。1868年，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清廷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

但没有得到响应。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容闳趁与曾国藩、丁日昌办理教案的机会，再次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得到曾国藩的支持。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名奏请“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次年又联名进呈“应办事宜六条”，得到批准。清政府委任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驻美负责留学生事务，并于1872年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办理招生事宜。1872年冬，陈兰彬带着第一批30名幼童到达



|| 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

美国。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幼童到美国，每批30名。到1875年总数已达120人。这些幼童的年龄从10岁到16岁不等，主要来自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省。他们到美国后，陆续进入各专门学校学习，其中大部分学自然科学，约有1/3学习政法。幼童赴美后，很快融入美国生活，他们有的剪去辫子，有的加入了基督教，因而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将留美幼童分批撤回。这样，除病故和不归的26人外，其余幼童都撤回了。回国后，他们大都成为外交、海军、电报、铁路、航运和其他科技领域的骨干力量。

此后，沈葆楨输送船政学堂学生去欧洲留学的计划也得以实现。1875年福州船政局总办丁日昌趁日意格返回欧洲之际，安排了5名最优秀的毕业生随同赴欧。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联衔上奏，要求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从海关关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万两作为经费。这一计划得到批准。随即选派18名学生赴法国学习制造和矿冶，12名学生赴英国学习驾驶，由李凤苞担任赴欧学生监督。1881年和1885年，船政学堂又先后派出四十多名学生到德国、法国、英国学习。他们回国后，在中国海军、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新兴社会力量

洋务运动期间，随着洋务工业化的产生、新职业类型的出现以及社会组织的分化，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开始瓦解，新的社会力量也随之产生。

19世纪60年代，随着商办企业的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他们中的大部分由官僚、买办、地主、商人转化而来，如创办宁波通久源纱厂的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府，并以盐务起家积累资本；再如上海公和永丝厂的创办人黄佐卿，与洋行关系密切，而买办祝大椿则是90年代成立的源昌缫丝厂的主要股东。据统计，1872—1913年，中国资本开办的25家纱厂，在41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人，商人5人，10人为买办。面粉工业，在1895—1913年开办的28家面粉厂、43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11人，商人15人，买办15人，华侨2人。^①其他行业也大体相同。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身成分比较复杂。他们当中，不仅官僚在农

^①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村中拥有土地，而且一些商人买办也在农村进行土地投资，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不少买办投资新式企业后依然从事买办活动。他们先天就与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保持较多的联系，有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一面。但外国资本利用从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进行金融垄断，控制我国海关和市场，极大地危害我国民族资本的独立发展；而中国的封建势力、顽固守旧官僚极力反对新式商办企业，厘金和各种苛捐杂税更是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这种生存环境，又使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及本国封建势力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现代产业工人的出现比民族资产阶级稍早一些，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在中国设厂，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工厂、码头工人。6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家在华投资设厂，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民族资本家兴办近代工业，近代产业工人的队伍扩大了。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万人左右，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近10万人，其中在外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有3.4万余人，占近代产业工人总数的35%左右。在中国人经营的企业中做工的工人6.2万余人，包括在官办军用工业做工的工人约9 100至10 810人。^①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外，还具有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主要由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同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在地域、行业、企业方面高度集中，有利于组织和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第三，中国无产阶级遭受最沉重的压迫，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们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三种压迫，这三重压迫的残酷性和严重性，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主要表现在：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实行种族歧视，视中国工人为“黄奴”、“苦力”，稍不如意就随意打骂和解雇；中国企业中实行封建把头制度，封建把头对工人进行监视、凌辱、盘剥和殴打。工人的劳动时间短则11~12小时，长则13~18小时。但工资却少得可怜。在当时外资企业中，中国普通男工每月工资1角5分到2角钱，最高也只有2角7分。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182、1201页。

最低只有五分到七、八分钱。外国资本家也承认，在中国用人工比用牲畜还更有利。工人的身体“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①

洋务运动时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产生。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出现了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队伍，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科技和企业管理人才。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留学人员。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包括洋务派办的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据统计，到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了1 000余所学校，学生近2万人。天主教教会所办学校亦超过1 000所，学生超过2万。^②在教会学校中，还有一批华人教习，如在格致书院任教习的徐寿、华蘅芳、陆仁堂、栾学谦等。洋务运动时期留美和留欧学生近200人。洋务学堂中的学生数虽无法统计，但从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发展中也能反映这一问题。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成立于1867年，第一届勉强录取学生30人，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但到1886年，有394人报考，录取108名；到1877年，便有学生120名。^③同文馆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外交和海关部门任职，或进入政府和军事部门，还有的从事教育，或在铁路等实业部门工作。^④三是在外人在华文化机构中工作和参与办报的华人。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传播西方文化，创办了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和报刊，这些机构中都聘用了中国人。如参与广学会译书、发行工作的蔡尔康、任保罗、许东来等人；在《万国公报》任主笔的沈毓桂、蔡尔康等；在《申报》任主笔或编辑的吴子让、蒋芷湘、钱昕伯等人。

总之，这些人成为中国最初的新型职业者。不仅如此，他们或接触了新思想，或接受了新教育，知识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出现，成为维新思想产生的基础。

六、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挽救危机的举措

甲午战争的惨败，既使清朝统治面临空前危机，也使当权者受到极大刺激，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振作。1895年闰五月，光绪帝发布谕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234页。

② 参见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页。

③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旨，提出要在这“国事艰难”之时，“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①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封疆大吏也纷纷上奏，主张练兵、发展实业、兴办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进行了一些改革。

（一）练兵。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很多人看来，是由于军事的落后，这种落后除了武器之外，更表现在军事制度方面，因此要学习西方兵制，改用洋操训练新军。1894年，清政府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编练定武军10营，全部用西法编练，甚为可观。次年，袁世凯接任。袁接任后，将定武军扩编到7 000余人，改名为“新建陆军”。编制上对西法实行变通，以步、炮、马、工程各兵种合为一军，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每兵种中以营为基本单位，下分队、哨、棚。聘请德国军官为教习，采用西法操练，武器全部购自国外。与此同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从卫队护军中选拔士兵，聘请德国教官进行操练，取名“自强军”。1895年成军时有步、马、炮各队共13营，士兵2 860人。^②

在建立新军的同时，1895年六月，清廷下令“挑留绿营精壮三成，其余老弱一概裁撤。”^③清政府的目的是通过裁减旧军队，用节省的军饷编练新军。但由于裁减绿营需要大量军费，所以各省多以财政困难为借口要求减裁、缓裁。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多数省只裁了二成或三成。

（二）发展工商业。1895年7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求各省办理制造船械，“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④。12月又颁布上谕：“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1896年又准御史陈其璋所奏，“凡各省产矿之处，准由本地人民自行呈请开采”。^⑤1897年，清政府表示要“提挈工商”，由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对于发明新学新器者，给予实官、虚衔、专售等各种奖励。在朝廷振兴工商政策引导下，甲午战争后各省官办机器厂局和官办、官商合办民用企业，民间私人资本都有所发展。

就军事工业而言，首先是原有制造局规模有所扩充。江南制造局于1890年筹建炼钢厂，1893年建栗色火药厂，1896年又建了无烟火药厂。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1页。

② 罗尔纲：《晚清兵制》第三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2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633页。

④ 同上：第3637、3638页。

⑤ 《德宗实录》卷378，第7页；卷385，第11页。

湖北枪炮厂也于1895年扩充了枪弹、炮弹、炮架三厂。其次是各省又新设了一批机器厂局：新疆机器厂、江西子弹厂、太原机器局、河南机器局等。

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以及先官办后招商的民用企业也有增加，如张之洞办的湖北纺纱官局，此外各省还办了一批采矿企业。^①总计1895至1900年间，各省新设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包括先官办后招商）的民用企业18家，资本额5 345千元。^②

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很多人反省失败原因，认为是铁路运输落后，导致运兵迟缓，因此视铁路为“自强之本”。1898年，清廷在京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并规划修筑芦汉、津芦等路，任命了铁路督办大臣。但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相进行铁路投资，致使一些重要铁路干线权益落入外人之手。

民间私人资本企业也有发展。据统计，1895年到1898年，新设立的民间私人资本企业62家，总资本额1 246.5万元。民间私人资本企业仍然主要分布在轻工业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纺织工业中，1895年之前只有官督商办和官办企业，而1895年至1899年新办的10家纺织企业中，除湖北纺纱官局外，其余9家都是私人资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896年严信厚在浙江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创办的苏州苏纶纱厂，长芦盐运使杨宗濂等在无锡创办的业勤纱厂，四品京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的通益公纱厂，1899年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等。^③新开办的11家煤矿中，也有5家是商办的，其中最大的是广东北海煤矿，拥有资本83.9万元。^④

1896年2月，清政府通飭各省于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一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将该省物产行情，综其损益，逐细讲求。”^⑤并要求在各府州县水陆通衢之处设立通商公所。此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苏州、镇江、通海设商务局，委派绅员，设法振兴商务；与此同时，山西巡抚胡聘之也创办商务局，调派绅员主持。

① 包括热河南票煤矿、湖南青谿煤矿、吉林沙河子煤矿、直隶磁州煤矿、湖北大冶煤矿总局、江西萍乡煤矿、江苏青龙江煤矿、四川麻哈金矿、直隶永平金矿、湖南中路久通矿务公司、罗田坪锑矿、锡矿山锑矿、木李坪锑矿、黄金洞金矿、黑龙江观都金矿、奉天通化怀仁金矿、湖南银矿坨锑矿等。

② 孙毓棠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869~919页。

③ 孙毓棠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892页。

④ 同上，第870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723页。

（三）教育方面，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在两方面进行的：一是设立学堂，如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江南储才学堂（1895年）、成都中西学堂（1896年）畿辅学堂（1897年）、江西务实学堂（1897年）、陕西中学堂（1898年）等。二是书院改制。如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将两湖、经心两书院照学堂办法改定章程；有的地方则在旧书院基础上酌增西学课程，或添设算学馆，增设算学格致等课。与此同时，1896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到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13人，此后，各省也陆续派遣留学生赴日，到1908年，赴日的留学生已达61人。

清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已难以使清政府真正摆脱危机。从内部来看，由于甲午战败后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已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筹集费用，清政府令各地督抚整顿关税、厘金、盐课，核扣京官及外省文武大小官员的“养廉银”，加抽土药厘税，还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①但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财政困难制约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从外部看，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纷纷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重要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纷纷落如外人之手，局部改革已难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七、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救亡图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



康有为像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少时接受封建正统教育，但并不专攻八股，经史子兵书无不涉猎。曾到广州附近西樵山白云洞面壁苦读一年，读佛、道之书，也读经世之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皇朝经世文编》，但寻不到救国之路，常常彻夜不眠，被视为“怪人”、“狂人”。22岁时读到《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西书，又“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法，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25岁

^① 当时准备发行1亿两，年利5厘，20年内归还。但实际只发行了1 000多万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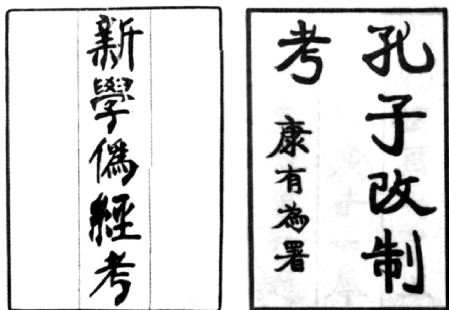
时，路经上海，购置西书。26岁时已“大攻西学书”、“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俛读仰思，日新大进”，^①进而产生学习西方变法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是中法战争之后不久，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中国边疆警报频传。康有为痛感在这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必须改变现状才能图强，于是决心直接上书，向皇帝吁请变法。

在《上清帝第一书》中，他历陈外患日逼，中国面临危局，要抵抗外敌，就要“内修政事”，讲求“变法之宜”。他还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②三点建议。此次上书因“大臣阻格，不为上达”，没有送到光绪手中。但上书在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子中传诵，使康有为声名鹊起。

1900年1月，康有为回到广州。第一次上书失败的经历使他深深认识到变法阻力之大，要推进变法，仅靠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培养维新人才；同时，还必须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守旧思想。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学堂，开始聚徒讲学，旨在培养维新人才，所以招收学生以能否接受他的维新思想为条件。陈千秋、梁启超等人成为他最早的学生。康有为讲学内容广泛，既有孔学、佛学、诸子学、宋明学、词章文学，也有哲学、史学、政治学、群学，还有数学、地理、格致学。讲学中，康有为每论一学，论一事，常常上下古今，旁征博引，并参以欧美各国事例，加以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课外，以自学为主。康有为给他们开列书单，每个同学备一功课簿，写读书心得，每半个月交给老师批答一次。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养成了以天下为己任、勤学好问的良好风气，学生人数也日渐增多。1896年，学校移到广州府学宫，正式起名“万木草堂”。康有为一边在万木草堂讲学，一边在弟子的帮助下进行变法理论体系著述，先后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等书。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辨古文经学之伪的书。西汉末，王莽代汉，复古改制，建国号“新朝”。康在此书中，通过大量的考订，力图证实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是由王莽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27页。

的国师刘歆伪造的，“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这些伪经重在“记事”，非“明义”，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康说自己“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目的在于“起亡经、翼圣制”。康有为的断言虽然在学术上不无武断之处，却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把长期被统治者视为天经地义的圣经之法宣布为非法，动摇和打击了封建守旧派“恪守祖训”的观念，引导人们对“卫道”和“圣经”产生了怀疑。

《孔子改制考》完成于1898年。该书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品，茫无可考。书中指出，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人的言论而制定了六经，尧舜文王是孔子改制所寄托的古圣先王，历史究竟有无已不可知，经典中记载的尧舜的盛德大业，只是寄托了孔子的理想。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英雄，是为自己的变法主张服务的。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亦可避祸。”康有为不仅主张孔子托古改制，而且认为周末诸子都是假托古代帝王的言论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理论核心是公羊三世说。公羊派解释春秋分为三世，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康对此加以发挥，说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认为，据乱世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升平世是行君主仁政的时代，而太平世则是大同之世，通过变法，就可以渐进大同之世。很显然，这种三世说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它说明中国社会一直在发展过程中，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从而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孔子改制考》的意义就在于它用孔子托古改制的类比，阐述了变法的合理性。

康有为的这些理论是惊世骇俗的。梁启超说，《新学伪经考》犹如思想界的飓风，《孔子改制考》是“火山大喷火也”、“大地震也”。^①前者否定了两千年来的传统经典，后者则树起了“圣人改制”的形象，从而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势力，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895年春天，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舆论沸腾。在京会试的举人纷纷以省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康有为悲愤之极，带领梁启超、麦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

孟华等弟子“日夕奔走”，于5月1日召集了18省举人在松筠庵举行集会，康有为怀着满腔悲愤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余言的上皇帝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痛切指出，割地赔款将会失去民心，“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为了挽救危局，他提出“权宜应敌之谋”，皇帝应下罪己诏，严厉处罚那些丧权辱国的大臣，以鼓天下之气；迁都西安，加紧练兵，以备再战。作为“立国自强之策”，就是要“变法成天下之治”。为此他设计了“富国”（建筑铁路、制造机器、保护发展民营工业、发展矿务、设邮政局等）、“养民”（设立农学会、推广农林技术，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之书，设立商会、商学）、“教民”（建立学堂、设报馆）等三大举措，还主张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凡内外兴革大政，以及筹饷等事，均在太和门召开会议，三占从二，以做到“上下通情”。^①在公车上书上签字的有1 300多人。但当上书递到都察院时，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批准为由，拒绝接受。上书虽然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但在大家手中传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维新运动开始的起点。

公车上书不久，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就职。这年5月，他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要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宇”。^②光绪帝看到了这次上书，立刻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6月，康有为又上第四书，进一步补充变法内容，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并要光绪帝下诏求言，开门集议，皇帝随时向轮班侍值之顾问咨询，顾问来自于翰林和荐举；还要广陈图书，设报达聪，目的是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但这次上书也未能上达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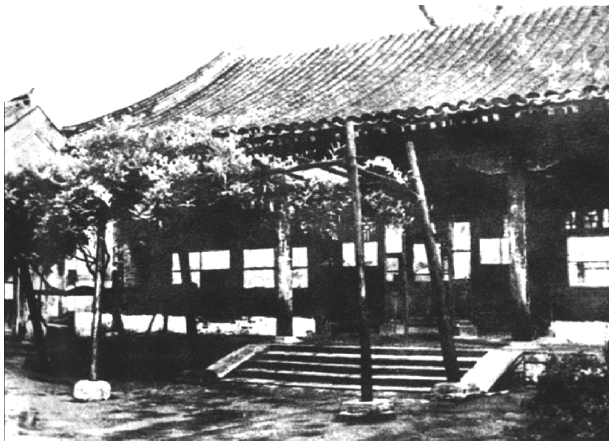
为了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康有为积极组织学会，发行报刊。1895年8月，《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后改为《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鼓吹维新思想，介绍各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每期印1 000份，随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在京官员阅读。后增至3 000份，逐渐引起一部分官僚士大夫的注意。



|| 梁启超像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52~153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66页。



北京强学会遗址

1895年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倡导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户部郎中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参加人员中，还有袁世凯、徐世昌等，支持者中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外省总督，翁同龢、孙家鼎、李鸿藻等中央官僚，还有外国人李佳白、李提摩太等，

成分复杂。其中坚人物是维新派与帝党。帝党要求摆脱慈禧的政治控制，倾向于改革现状，因此维新派援帝党以自重，帝党也拉维新派以自用。为了扩大势力，又把一些与李鸿章有矛盾的官僚拉了进来，其内部矛盾复杂，但也引起后党不满。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奏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太后借机下令查禁了《中外纪闻》和强学会。

强学会虽遭封禁，但当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1896年8月，上海《时务报》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此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在上面发表了《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阐明变法的必要性，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时被称为“神童”，8岁时作八股，9岁能写洋洋千字的好文章，11岁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翌年入京会试未中，归途中经上海接触到西学，回广州拜康有为为师，入万木草堂，协助康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1895年赴京会试，参与发动“公车上书”，主办《中外纪闻》。1895年8月，强学会成立，任书记员。1896年8月，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反复强调变法的重要性。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梁启超把兴民权作为变法的根本。他指出，西方国家民权发达，“人人有自主之权”，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因此能人人“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从而造成国家强盛。中国专制制度“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结果是中国长期积弱不振^①。他认为，兴民权要以议院为本，开议院以学校为本，办学校须用西学来开民智，从而为开议院、兴民权作人才准备。

梁启超的文字流畅、犀利、充满感情，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官僚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时务报》发行数迅速增至一万多份，“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②

湖南省是维新派最活跃的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都有一定的政治改良倾向，再加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的积极活动，维新运动迅速开展。1897年9月建立长沙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提调，梁启超担任总教习之一，宣扬康有为的改制学说。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成立南学会。谭嗣同成为湖南最为激进的维新派代表人物。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84年到新疆，为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僚，以后游历了许多省份，对社会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年轻时，受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影响。甲午战争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痛感不能“守文因旧”、“苟且图存”，因而决心摒弃一切，倡导变法。^③ 1895年，康在京成立强学会，谭听到消息立即赶到北京，以自己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自命，1897年回到湖南与唐才常办时务学堂，创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新报》，鼓吹变法。它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仁学》一书中。

《仁学》完成于1897年。在此书中，谭嗣同尖锐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并把秦以来的



谭嗣同像



《仁学》手稿

① 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9页。
 ② 胡思敬：《梁启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7页。
 ③ 谭嗣同：《上欧阳瓣菴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3页。

君主斥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把秦以后历代封建政治说成是暴政，是强盗政治，实际上是对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作了全盘否定。他联系中国近代历史，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因而进一步指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甚至还引用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话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①谭嗣同还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主义的伦常礼教。他指出封建主义的伦常礼教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故意制造出来以压制人民的，“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伦常礼教的罪行：“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要求破除这反人道的精神枷锁，否则，政治上的改革就无从谈起，“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②

谭嗣同的文字，词锋锐利，思想深刻，梁启超评价“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谭嗣同的思想对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邹容的《革命军》就借鉴了《仁学》中攻击君主专制的词句，还题诗在谭嗣同的遗像上，自勉要做谭的“后来者”；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谭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

在天津，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并于1897年创办《国闻报》。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出身乡村中医之家。1867年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船上实习，1877年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阅读大量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著作。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员，1880年被李鸿章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任会办，次年升总办。留学英国期间，严复曾广泛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回国后，目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因而积极鼓吹变法自强，并用西方社会科学学说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在《辟韩》中，严复以“天赋人权”思想为武器批判君权神授说，“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君是因“民事”



|| 严复像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9、337页。

②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9页。

而产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君臣民关系是按通功易事原则而建立的社会契约关系，^①人民之所以立君，只不过是择其公且贤者为人民办事者也。但他又认为，“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中国的变法要从开民智做起，“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即提高人民“血气体力”，提倡医学，严禁鸦片，禁止妇女缠脚；提高人民“聪明智虑”，废除八股科考，提倡西学；提高人民的德行仁义，培养人民的国家观念和主人翁思想。^②



|| 严复译《天演论》

1895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主要介绍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严复翻译此书的主观政治意图，就是通过宣扬其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发挥自己要求变法自强的政治观点。呼吁只有顺应“天演”的规律，厉行变法，才能由弱变强，获得生存，否则就有被淘汰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如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③这也正适应了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需要，因而向中国人民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天演论》带来了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使其迅速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梁启超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人，“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天演论》还没正式出版，他就根据其做文章，进行宣传了。西方思想的介绍和进化论的传播，在维新理论方面，突破了康有为单从古代圣人那里寻找理论根据的狭隘性，给了人们以新的科学方法论。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有39种，^④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维新变法思潮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他们极力诋毁维新派和维新思想。在湖南，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和士绅叶德辉等向巡抚陈宝箴递交了一份《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攻击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之乘风扬波，

①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34页。

②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7页。

③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④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肆其簧鼓”，时务学堂学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这样下去，将“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①要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但被陈拒绝。他们又撰写文章，攻击南学会“逞其邪说，放厥淫词”^②，并罗列“首创邪说，背叛圣教”的罪名，把邵阳分会会长樊锥驱除出境，又迫使在南学会上演讲最多的皮锡瑞离湘赴赣。

维新运动开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一度采取支持态度，他捐金五千赞助强学会，还拨款1 500两办上海强学会。《时务报》发行后，张之洞即饬行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按期寄送一本。但是，随着维新运动发展，张之洞很快就与维新派分道扬镳。原因就在于他认为维新派持论过激，以致触及到官僚士夫所视之为“本”的那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写下《劝学篇》，目的就是要“辟邪说”、“正人心”。

《劝学篇》所要“辟”的“邪说”，就是维新派所鼓吹的“民权”。张之洞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自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是万万不能行的。张之洞强调：“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③

“中学为体”实际包含着封建专制政体及其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改变之义。当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时候，这一思想具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由于《劝学篇》从理论上系统地对“中体西用”思想作了阐述，因而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当时光绪帝就发布谕旨，将《劝学篇》刊印40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④使《劝学篇》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胥而遍于海内”。

八、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得知后，“中夜屑涕，仰天痛哭”，并于12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敏锐地指出，德据胶澳，列强必将群起效尤，“瓜分豆剖，渐露机牙”，如不及时变法，革旧图新，那么“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

① 《湘绅公呈》，《翼教丛编》卷5。

② 王献俊：《上王院长书》，《翼教丛编》卷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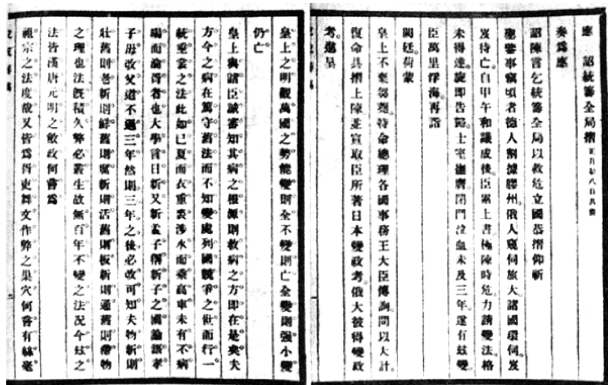
③ 冯天瑜、肖川点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209页。

④ 同上，第18页。

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为此，他提出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选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学习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发动六部九卿诸臣谋议变法；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即通飭各省实行变法。^①他还要求皇帝“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这次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淞桂不肯代呈，未能送达皇上。但在京师广为传抄，津、沪的报纸也予以刊登，影响很大。

这时，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上奏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当天光绪令交总理衙门“酌核办理”，但奕訢等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加以阻拦。光绪帝不得已，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康有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荣禄首先以“祖宗成法为何要改”的问题向康有为发难。康有为义正词严地反驳：“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②他一一批驳了大臣们的责难，反复阐明了变法的必要性。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次日早朝，翁同龢向光绪帝汇报了问话的情况，并加举荐。光绪听后十分赞赏，令康有为条陈所见，不得阻拦，并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书。

康有为奉旨上书条陈所见，因而大受鼓舞。他奋笔疾书，又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于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在上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形势，说明中国已面临瓜分危局，已到“不能不变之势”，如再不知变革，则“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他指出变法的必要：“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提出当务之急应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



|| 《应诏统筹全局折》

康有为奉旨上书条陈所见，因而大受鼓舞。他奋笔疾书，又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于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在上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形势，说明中国已面临瓜分危局，已到“不能不变之势”，如再不知变革，则“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他指出变法的必要：“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提出当务之急应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89～197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0页。

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鉴于变法所受到的阻力太大，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没有直接提开议院问题，而是主张开制度局推行新政改革，在其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在地方，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具体督办新政工作。《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施政纲领。光绪皇帝看后十分满意，置御案时加披览，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不久，康进呈《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并上了第七书。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②遂结合各省人士纷纷组织学会。1898年1月，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在京成立粤学会。随后，关学会（又称陕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4月，正是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和御史李盛铎共同发起组织保国会。1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呼吁在这瓜分危机严重之时，“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他撰《保国会章程》，宣称该会宗旨是“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即“保国、保种、保教”。^③章程还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分会。此后，各省旅京同乡相继成立了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康有为和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促进了百日维新的到来。

其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危亡的形势下，光绪皇帝“不欲为亡国之主”，深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不足以“固结人心”，因而产生了变法的思想。当时的光绪，虽然自1889年起开始亲政，但是慈禧太后并不愿意放权。在她归政时，就拟定了一个《归政条目》，规定光绪皇帝披阅奏折及其作出的重要决定，都必须当天让慈禧太后知道。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皇帝还必须事前请示皇太后方能执行。根据这些规定，即使光绪亲政，慈禧仍能牢牢控制政权。随着光绪的成熟，他日益对自己的



|| 翁同龢像



|| 光绪皇帝像

① 《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务府抄本。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③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

这种无权地位感到不满，与慈禧的关系逐渐紧张。这样，在皇帝与太后周围隐约形成了“帝党”与“后党”两个圈子。“帝党”主要有帝师翁同龢以及珍、瑾二妃的堂兄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而“后党”则大多为掌握实权的满族亲贵、军机大臣等。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也想借此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束缚。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清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898年5月，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病死，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康有为认为时机难得，便上书翁同龢，促其提请光绪帝立即变法。还于6月1日和6日分别代杨深秀和徐致靖拟奏折，请光绪特降谕旨明定国事。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期间，光绪帝颁布了一百多道上谕，推行新政。

政治方面，光绪多次下诏，提倡上书言事，给士民一定的言论自由。改定则例，裁撤冗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澄清吏治，拔擢新进；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对康有为设制度局的建议，光绪也是赞同的，要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总理衙门极力推延，迟迟不办，光绪“日日催之，继之以怒”。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最终没有成立。经济方面，设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分局，裁撤驿站；各省办商务局，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奖励创制新法者；提倡采用中西各法振兴农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①命各地开办中小学堂；成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选派留学生；创办京师大学堂；开办矿务、医学农业等专门学堂。鼓励士民办报，以“开扩见闻”，使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裁减绿营，力行保甲，精练海陆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

这些新政诏令，旨在通过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其结果，必然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也有利于维新派参与政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尽管新政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统治秩序，但仍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新政开始，当慈禧看到“明定国是”诏书时，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但第四天，她就拟了一个懿旨，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

^① 《德宗实录》卷419，第5页。



|| 荣禄像

勒令其回原籍。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对光绪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罢黜翁同龢，也就等于砍去皇帝的一只臂膀。光绪接到懿旨，“惊魂万里，涕泪千行”，但在慈禧的威逼下，不得不同意以皇帝名义下达。之后，慈禧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6月23日，授她的嫡系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控制了京津一带的兵权。重申授二品以上大臣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用以控制黜陟大权。加强了对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戒，密切监视

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帝党展开了一定的反击。光绪一方面颁布新政上谕，另一方面又任用维新派。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7月3日，赏梁启超六品衔，命办译书局事务。帝党宋伯鲁等奏请废八股，后党成员礼部尚书、总理大臣许应骙则多方阻挠，并回奏光绪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光绪上谕对许进行责斥，“该尚书嗣后遇事当益加勉励……毋负委任”。^①后来礼部主事王照上折请光绪游历日本及各国，并请设商部、教育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仅不肯代递，反而上折弹劾王照“居心叵测”。9月1日，光绪下谕以“广开言路”，各部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为由，将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大臣革职查办，^②又任命了六个新的礼部堂官。9月5日，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14日，光绪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设议政官，进一步重用维新派。其中任命新的礼部堂官和军机章京，都是在没有征求慈禧太后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不能不引起慈禧的仇恨。

14日，光绪把政务处理完毕后照例到颐和园请安。当他把开懋勤殿之事向慈禧汇报时，立即引起慈禧的警觉。懋勤殿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光绪提出参加者为“通达英勇之人”，其结果，必定会成为政治决策中心。这将是对自己权力的剥夺。她立即向光绪提出了警告：小心不要越出权位，若那样，他的皇位将“不能保”。^③慈禧的警告，使光绪万分惊恐。15日，他召见杨锐，授以密诏，要杨锐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妥速筹商”解救办法。康有为等看到密诏，相对痛哭，只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101页。

② 《德宗实录》卷424，第10页。

③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5页。

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他们认为袁曾加入过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在天津小站练兵，握有兵权，可以利用其来保驾皇帝。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当天发下谕旨，命其以侍郎身份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也就是取得了直接给皇帝的上奏权。17日，慈禧太后强令光绪下旨，令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开办“官书局”。慈禧此举的目的，是割断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系。18日光绪离开颐和园回宫。同一天，御史杨崇伊上了一个奏折，提出请慈禧训政。提出的理由中有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并密告光绪将在次日会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接到奏折，慈禧如获至宝，但看到光绪将会见伊藤博文的新闻，又大为怀疑，认为光绪是“勾外国谋我”。于是当即决定次日回宫。

同一天，维新派也在紧张地进行挽救新政的活动。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天津袁世凯寓所，劝说他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当面信誓旦旦表示向皇帝效忠。19日，慈禧回到西苑。当天，光绪移居瀛台。但据学者考证，此时光绪还未被囚禁，原因是光绪仍然可以处理政务。并在20日这天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还定于中午11时召见伊藤博文。但是到9月21日，风云突然大变。慈禧宣布训政，下令捉拿康有为。袁世凯于20日接受光绪召见后回到天津，当夜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的密折于22日带到北京。袁世凯的告密加剧了政变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先是整肃了光绪身边的太监，并在瀛台软禁了光绪。^①

政变前一天，康有为已离京赴沪，途中得知政变发生的消息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有人劝谭嗣同逃往日本，谭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9月25日被捕。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



■ 囚禁光绪帝的中南海瀛台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61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页。

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参与新政及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革职、囚禁或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及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下来外，其余都被取消。旧制重新恢复，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情况下发生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在运动中，维新派大力呼唤“兴民权”、“开议院”，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们极力提倡机器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还通过学会、学堂、报刊，热情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思想。维新运动是一次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推进的近代化运动。由于维新派力量的弱小和政治经验的不足，导致在推进变法的过程中操之过急；也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势力太过强大，变法失败了。但是它却打开了近代中国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大门，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开始了新的变革尝试，维新派力量也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

九、1901—1905年间的改革

19、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初，清政府已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在经济方面，各国在加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还扩大了对华资本输出，铁路和矿山投资成为各国角逐的焦点。英国除强行承筑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外，还与德国分割了津浦路的路权；俄国取得了经营管理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权利，还迫使清政府允诺其承筑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铁路的优先权；法国夺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参与了对芦（芦沟桥）汉（汉口）路的争夺。日本则于日俄战争后取得了安（安东）奉（沈阳）路、南（南昌）浔（九江）路、京绥（绥远）路的修筑和借款权。各国通过修筑经营铁路，还取得了铁路沿线森林的砍伐权和矿山开采权，铁路成为他们扩大侵略权益的重要途径。这样，到1911年止，在中国已修筑的9 618公里铁路中，93.1%被帝国主义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①各国还纷纷染指中国矿山开采，到1906年，中国已开煤矿中，外资开采的占39.8%，中外合资的占40%。^②如日本就是通过借款方式，逐步掌握了汉冶萍公司的控制权。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0页。

② 同上，第127、132页。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和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彼此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俄国曾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派兵占领了中国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拒不撤兵。1902年4月，中俄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军同意于一年半内分批撤出。但到1903年，俄军不仅不撤兵，反而得寸进尺向清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独霸东北。俄国的行径与日本的侵华野心发生了冲突。1904年1月，日本不宣而战，向驻扎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起袭击，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一年，以日胜俄败而结束。在美国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中国东北南部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从而使东北处于日俄两国的掌握和分别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英国于1903年至1904年发动了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抗击。1904年8月，拉萨被攻陷。190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英条约》，除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赔款50万英镑外，还规定：非经英国许可，不得将土地、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让与其他国家。实际上将西藏划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世纪之交清政府面临的统治危机，还表现为中国内部社会更加动荡不宁。1900年，正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之时，中国南方也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这年8月，维新派以“勤王”为名义举行武装起义，领导人是唐才常。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定于8月9日举行起义，在长江流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了自立军七军，准备推翻清政府，“请光绪帝复辟”。但由于海外汇款未到，起事日期推迟，加以消息泄露，8月下旬，张之洞逮捕并杀害了唐才常等人，自立军失败。二是革命党人于这年10月领导的惠州起义。起义曾一度占领了惠州一带沿海地区，并迅速发展至2万多人。但在清军的追击下，在坚持了半个月以后，因弹尽粮绝而被迫解散。自立军起事是维新派领导发动的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它的失败，促使一批爱国志士转向革命。革命党人领导的惠州起义虽然只偏于广东沿海一隅，但它却昭示着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崛起，昭示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在下层民众中，反洋教斗争并未因义和团被镇压而停止。仅1901年见于记载的反洋教斗争就有18次之多，有的甚至打出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号。此外，广西会党反清斗争也此起彼伏，终于汇集成规模巨大的广西会党起义。

从清政府自身来看，巨额的庚子赔款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财政危机。为了偿还每年2 000万的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向各省摊派，通过种种苛捐杂税向人民搜括。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清政府不得不通过改革来摆脱危机。1901年1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声称“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故而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还明令高级官员“参酌中西政要”，就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财政提出改革建议。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议商变法条陈之地，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大臣，新政开始。7、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提出变法奏议三折。第一折提出育才兴学4条，包括设文武学堂，改文科科举、停罢武科、奖劝游学。第二折为整顿中法12条，主要是：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第三折论采行西法，列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津、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11条。刘、张会奏得到朝廷认可。慈禧命将其中可行者“择要举办”，各省“亦应一律通筹”。^①

此后，清政府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名，会办大臣及会办大臣兼尚书各一人。内设各司分别执外交、通商、路矿、关税、邮政、海防等事务。这一改革的意义在于：总理衙门虽成立于1861年并延续下来，但在清朝官制中，它却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洋务的机构，大臣都是兼任的。这一次，将其改为外务部并列于六部之前，不仅使它成为常设的正式的外交机构，而且突出了它的地位。

发展工商。1903年8月成立商部。载振为商部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职责为管辖所有工商路矿和农垦、农牧方面的事务。商部成立后，制定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章程》等一系列商法，提倡私人资本办实业，以立法形式给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以某种保护。还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了对经营工商业者的奖励办法，如凡能集股50万至5000万的工商业者，奖以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位，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尽管实际得到奖励的人数微乎其微，但这一政策的颁布，多少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改革教育。首先是科举制度的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从1902年起，科举考试不再用八股文。1905年，又有袁世凯、赵尔巽、张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771页。



|| 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

之洞等督抚联名上奏，提出“补救时艰，必自推学校始；欲推广学校，必自停科举始。”^①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其次是新学校体制的建立。1903年12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提交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一个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制体系。即把学校教育分成初、中、高三级，最高一级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大学毕业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可以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新学制颁布前后，国内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已达4 222所，学生96 169人。再次是留学教育的开展。1903年清政府曾颁布《奖励游学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鼓励出国留学。在政府的提倡下，清末形成了留学、尤其是留日高潮。1901年留日学生274人；1903年达到1 242人；1906年高达1.2万余人。在教育改革已经全面开展的情况下，1905年11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任命荣庆为尚书，熙英、严修为左右侍郎。

改革军制，训练新军。新军的组建始于1895年。这一年，袁世凯以督办军务处差委到天津小站练兵，以胡燏棻的一支4 000人的定武军为基础进行招募，成为“新建陆军”。与此同时，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江宁成立了一支2 600余人的自强军。1901年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取消武举，要求各省创办武备学堂，裁撤20%~30%的绿营和半正规的防勇，

^① 《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0页。

挑选精壮，编练常备、续备、巡警各军。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总理练兵事宜。练兵处成立后，改建全国兵制，并制定了一个编制36镇新军的计划。此外，清政府还于1905年10月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督办各省巡警。

除适应改革的需要调整旧机构、增设新机构以外，清政府还裁撤了詹事府、通政使司等旧机构，裁撤了东河河道总督缺和督抚并设共处一城的云南、湖北、广东巡抚缺。整顿吏治，裁汰了政府各机关的胥吏差役，并于1901年8月正式停止了捐纳实官的制度。

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机构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政体，但对中国社会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推动了教育、军事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这些变革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中国社会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壮大。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阶层发生分化，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开展而迅速崛起；新军的建立，同时也为新思想向军队的输入提供了条件，从而成为革命党人发展革命势力的重要基础；新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实行，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的条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阶级意识也在增强。抵制美货、收回权利运动逐步开展，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力量。

十、“预备仿行宪政”

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但是改革结果却使很多人失望，他们认为“新政不新”，迫切要求把改革推进一步。这样，一股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潮逐渐兴起。1904年，在中国爆发了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日俄战争，许多人把日胜俄败的结局视为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立宪思潮趋于高涨。在这种局面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部分高级官员受到震动，立宪改革之议迅速兴起。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督办政务处：“日闻民族危论，推心疾首，无地自容”，因而“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宪制为立宪政体之国。”一些封疆大吏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也纷纷奏请立宪以图自强。

民族危机的严重，国内革命运动的兴起，立宪思潮的发展，这一切都促使清政府作出反应。1905年7月，清廷作出派使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决定。9月，派五大臣分两路分别进行考察。其中载泽、徐世昌、绍英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与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

利、奥地利、俄国。起程当日，在北京火车站发生革命党人吴樾暗杀五大臣事件。考察推迟到12月出发，成员由尚其亨、李盛铎分别取代了徐世昌和绍英。这次考察历时半年，周游了14个国家。五大臣回国后向清廷提出了推行立宪的建议。认为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主张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称：“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确定先从官制入手次第更张，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再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立宪的基本国策就此确定。此后，清政府逐步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后，第二天即宣布进行中央官制改革，并成立了由载泽等14名官制编纂大臣组成的编制馆。一个月后，编制馆拿出了初步草案，改革军机处及原有的部院体制，设置责任内阁。这个草案一出，立即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慈禧于11月6日再下上谕，原有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于是，军机处仍保留下来。中央官制改革只对行政机构作了调整：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巡警、户部、兵部分别改为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同时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另设邮传部。由于清廷明令军机处不变，仍为“行政总汇”，所以中央官制改革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以皇帝为行政中心的高度集权体制。

在中央官制改革的同时，清政府还着手进行地方官制改革，这一改革首先在东三省试行。东三省原为特别区域，以盛京将军为最高长官。1907年4月，清政府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每省设巡抚一员。各省设行省公署，下设各司主管各方事务，并设承宣厅，以为办理全省一切机要总汇之地，设议政厅专为议定一省法令、章制及研究本省兴革事宜。东三省官制初步改变了其他省原来督抚之下藩、臬分署的旧制，实现了省级行政的合署办公。在试行东三省改革时，清廷曾向各省督抚征求地方官制改革意见，相当一部分督抚主张维持旧制，略加变通。在这种情况下，7月，清廷颁布地方官制改革章程。这个章程与东三省改革不同，仍置总督掌一省或数省外交军政，巡抚掌地方行政，下设布政使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及巡警道、劝业道，地方官制改革并没有对原有体制进行很大的变动。

1911年5月，国内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得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国务大臣10人，以调整后的10个部(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大臣兼充。由于国务大臣由皇帝“特旨简任”，因此摄政王载沣为了保住祖宗之权，在内阁的组成上玩了手脚，内阁成员13人，其中满族9人，皇族就有7人。所以内阁成员名单一公布，举国大哗，将其讥为“皇族内阁”。

立法体制的建立。先看宪法的制订。1907年，清政府将五大臣考察宪政时成立的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负责宪法大纲的起草工作，并于1908年8月27日公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计23条，分“君上大权”与“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在“臣民权利义务”中，对人民的基本权利有所肯定。大纲序言指出：“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臣民的权利义务主要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即臣民受法律保护及财产、居住的权利；臣民当遵守法律及纳税、当兵之义务；另规定：“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规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员及议员”。对于“皇上大权”，大纲序言载明：“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确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和关闭议院、黜陟百司、设官制禄、编订官制、统

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告戒严、发布命令及总理司法等权力。可见君主权力仍是很大的。当然，宪法对君主权力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已定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这就是说，君主无权废止议院通过的法律。但是，由于宪法赋予君主解散议院权，所以议院对君主的限制是非常无力的。总之，大纲所确定的，是一种保留封建专制残余最多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政体。



湖北谘议局旧址，也是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所在地。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立即形成全国燎原之势。清政府在行将灭亡前又作了最后的挣扎。10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三天后又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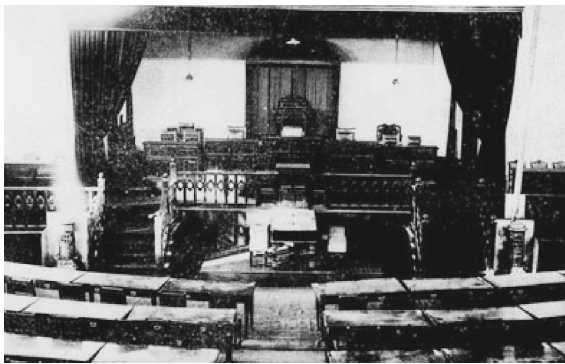
制了一个《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信条),将《钦定宪法大纲》中的二元君宪体制改为虚君的一元君主立宪制,将立法权赋予国会,将行政权归于内阁,保留皇帝的布宪权、大臣任免权和率军权,由袁世凯任总理大臣。不过它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王朝就灭亡了。

再看立法机构的准备。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时,核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以9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同时拟定了谘议局章程。其中关于立法机构的安排是:第一年筹办省谘议局;第二年选举并正式开办,同时举行中央资政院选举;第三年成立资政院。1908年,各省先后进行了选举工作。因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实际参加选举者占人口总数的平均比例是0.42%,即每万人中有选民42人。^①1909年,全国各省除新疆外均成立了谘议局。谘议局为地方议政机关。谘议局章程规定:“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议员在这里议决省内兴革各项事宜,纠举不法官吏,办理各项新政,表现了一定的参政议政热情。但谘议局章程又规定:谘议局所通过议案,必须报请督抚认可,督抚还有权“奏请解散”谘议局,如此又限制了它的独立性。

资政院为中央议政机关,于1910年9月23日正式成立。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类。钦选议员为宗室王公贵族、中央部院官员,共98人;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也是98人。清政府设立资政院旨在“以立议院基础”,即作为正式议院的过渡。其职权包括议决奉旨飭议事件、新定和修改法律、讨论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和人民陈请事项,已具有立法的职能。但它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行政府施行之权”,议员也不是民选产生,只是略具备议



|| 预备立宪时期建立的资政院大楼



|| 资政院会场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6页。

院雏形而已。

司法体制改革。中国古代法制的最大问题，是政(行政)刑(司法)合一；法律内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法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与近代化的需要。1903年，清政府设置修订法律馆，以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他们“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与考证”，提出了建立新的法制体系的方案：（1）废除清代的三法司制度^①，实行四级三审制，即改变省、府、县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的旧制，在县、府、省设置初级、地方和高等审判厅，最高一级审判机关为大理院。确定重大案件及死刑案由地方、高等审判厅初审、二审后，由大理院进行终审判决。（2）审判制度方面，规定“行政主管不准违法干涉”，实行回避、辩护、陪审、公开审理等一系列现代化审判制度；规定一审、二审的判决要“合议决定”。（3）制定新律，改革“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1910年颁行过渡刑律《大清现行刑律》，将民事案与刑事案区分；更定刑名，改革死刑案执行办法，废除酷刑。还制定了民事诉讼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等单行法规。中国法制近代化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根据清政府筹备立宪的安排，府州县各级地方自治的工作也于1909年起在全国铺开。清政府采取了逐项准备的办法，先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从事调查、选举事宜，同时开办地方自治研究所，培养、训练自治人才。然后先推行城镇乡下级自治，再进行府(厅)州县上级自治，预定1914年各级自治一律成立。如奉天至1911年8月，下级自治已成立者，城41所，镇62所，乡302所；上级自治府州县已成立自治者46所，除少数县外，全省两级自治一律竣事；直隶于1911年8月宣称，已有124个府厅州县成立自治组织，还成立了80个城镇乡的自治组织。一些偏远省份，如新疆，到1911年上半年，各府州县自治研究所都已设立；在云南，有27个城市的下级自治已经成立。^②由于清政府的垮台，这项工作没有最后完成，但地方自治的开展，对推动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廷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借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族的权力，这在载沣监国后尤其明显。袁世凯自1901年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又编练了北洋六军后，势力急剧膨胀。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

^① 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清朝规定，凡死罪要由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审理后，再由皇帝批示，然后执行。

^②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61页。

去世。不满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溥仪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载沣监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为了将权力、尤其是军权集中到自己手中，载沣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涛和皇族毓朗会同铁良建立一支新的禁卫军，直接由自己统率。这支禁卫军虽然在军制上与新军相同，但士兵全部是满人，管带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为了培养满族子弟，他们还在北京办了个贵胄学堂，摆开了一个大练皇族军的架势。1909年2月，载沣颁旨下令筹办海军，由其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7月，载沣又下一道谕旨，宣布自己代理皇帝为海陆军大元帅。同一天，把军咨处从陆军部的管辖下分出来，由载涛、毓朗管理。军咨处不仅是一个军事参谋机构，还有权提名海陆军将领、指派参谋僚佐，还有对各省军事和保定军官学校的监督权。并且，军咨处的建议经皇上批准交陆军部后就可成为命令。还令各省设督练公所统辖军营。督练公所设军事参议官一员，由陆军部奏派，负责全省新旧各军及筹备粮饷编练队伍一切事宜。这些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的举措不仅扩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而且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十一、立宪派与国会请愿运动

在20世纪初迅速兴起的立宪思潮中，除原来就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外，还有一批官绅和知识分子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使上述鼓吹立宪的人大受鼓舞，为了促使宪政早日实现，他们开始组建团体，一时间宪政团体纷纷出现。

最早建立的是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则是江浙实业界和绅商著名人物张謇与汤寿潜。预备立宪公会宣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①因此成立后致力于普及宪政知识和推动朝廷立宪，编辑出版了《公民必读》等宪政宣讲材料，还举办法政讲习班，培养地方自治会议员、董事。

1907年2月，康有为将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并于3月下旬在纽约召开了各埠代表大会，通过会章，确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

^① 《预备立宪公会简章》，载《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期。

“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①同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召开成立大会，以马相伯为总务员。发布的宣言书提出了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制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等政治主张。

除上之外，还有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杨度在日本创立的宪政公会，以及湖北宪政筹备会、贵州自治学社等立宪团体。据统计，这一时期成立的立宪团体近80个。^②以立宪团体的成立为标志，立宪派迅速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

立宪派把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作为自己基本的政治追求，因而积极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行动。但是，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步骤的展开，立宪派的不满情绪也逐步滋长。这种不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立宪从何入手。清政府把官制改革作为立宪的第一步，而中央官制改革却又保持军机处不动。在立宪派看来，官制改革的结果“适足愈巩固其专制势力”，因而主张立宪改革必须从建立国会着手。二是建立国会的期限问题。清政府认为，立宪必须循序渐进，召开国会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因此确立了九年召开国会的期限。立宪派则认为九年时间太长，认为只有速开国会才能迅速革除贫弱，故而主张速立国会。为推动清政府的立宪步伐，立宪派开始了和平请愿行动。

1907年9月，宪政讲习会代表熊范舆、沈钧儒等人进京，向都察院递上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提出：“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要求清廷于一两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③但政府并未给予理会。第二年3月，宪政讲习会又发动4 000人签名，上了第二封请愿书。宪政讲习会的请愿行动得到各省立宪团体的响应。1907年10月，帝国宪政会发动海外华侨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要求速开国会；政闻社、粤商自治会、预备立宪公会则发出电奏，请开国会；1908年7月，河南绅民5 000余人签字并派代表进京呈递请愿书。接着，安徽、江苏、吉林、湖南、直隶、山东、北京、山西、浙江、广东等省纷纷举行集会，并于8月派代表入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多则2万多人，少则也有数千人。

请愿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大为恼火。一些顽固守旧大臣将请愿看

① 《帝国宪政大集议会议序例》，《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页。

②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精华印书馆1971年版，第90~143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9~616页。

成是“扰乱国是”、“若准如所请，实为堕其术中”。1908年8月，清政府以“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为名下令查禁了政闻社。

1908年8月，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定了9年召开国会的期限，作为预备，各省先设立谏议局。这样，立宪派将活动重点转向谏议局筹备和选举工作。不少立宪派人成为谏议局议员。他们以谏议局为基地，又一次掀起国会请愿高潮。

1909年10月，江苏谏议局局长张謇联合各省谏议局开展共同请愿活动，并派有关人员分赴南北各省联络。12月，16个省的51名代表到上海，经过讨论，通过了进呈的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并组成了30多人的请愿代表团。1910年1月16日，到京代表赴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并在京组织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1月30日，朝廷颁发上谕，以“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亦足为宪政前程之累”^①为由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请愿失败。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人准备发动第二次请愿。为扩大声势，他们派出特派员，游说各省商会、学会和其他团体，号召“各省以绅民之名，自举代表上书请愿，其签名之人，必须普遍于各府、厅、州、县，不可限于省城，人数愈多愈善。”^②经过较为广泛的发动之后，立宪派在各省征集了近30万人的签名运动，并组织了10个请愿代表团。6月16日，代表齐集都察院，递上了代表各界的10份请愿书，要求1年之内召开国会。6月27日，清廷颁下诏旨，再次强调财政艰难，“匪徒滋事”，宪政必须分缓急先后。二次请愿又被拒绝。立宪派人并不气馁，他们组织谏议局联合会，并准备发动第三次请愿。10月，资政院开会，请愿代表孙洪伊向资政院呈递了由187人署名的请愿书，请资政院提议于1911年召开国会。22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26日，请愿代表团又直接上书载沣，向政府指明：“人心向背，皆在朝廷一举动间以为标准。”^③与此同时，立宪派还在各省发动了请愿集会游行。在奉天，全省有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参加者均在1万以上，签名者达30余万。^④形势的发展，使一部分地方督抚看到非速开国会不能立挽时局，因而也联衔入奏，要求速开国会并成立责任内阁。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1~642页。

② 《国会请愿代表团为续行请愿分途运动事致苏商总会函》，见《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页。

③ 《国民公报》1910年10月28日。

④ 侯宜杰：《二十世纪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在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载沣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表示。11月4日发布上谕，宣称“俯顺臣民之请”，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并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静候朝廷次第施行。

国会期限缩短了三年，有的立宪派认为目标已经达到。江苏谘议局致电资政院，表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极涕

零”。但多数立宪派人并不满意，积极谋求第四次请愿。12月6日，奉天各界代表一万余人举行集会和请愿游行，请东三省总督锡良代奏请愿书，还派出代表进京请愿。接着，直隶也派出了进京请愿代表。这一次，清廷开始采取强硬手段。清廷颁布上谕，称请愿代表“乃无识之徒”，“仍肆要求”，令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还令各省“严加查办”。并用军警强行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回奉天。而在直隶，总督陈夔龙则派军警镇压学生请愿活动，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开课；还在清廷的指令下秘密逮捕了请愿领导人温世霖。第四次请愿失败。

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立宪派所提出的目标和请愿活动为清政府所不容。立宪派所要求召开的国会，是有独立立法权力、且能监督政府的代表人民参政权的国会，而清政府虽也同意开国会，但只是在君主权力之下的立宪点缀品，因此根本无法答应立宪派的全部要求。此外，清政府还害怕人民，他们把群众请愿视为“民气嚣张”，请愿代表是“其心不可莫测”，最后用专制手段镇压了请愿。从立宪派方面来看，他们对清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希望以请愿的声势来感动政府，当清政府采取镇压手段时，他们不敢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致使请愿运动难以坚持下去。但是，请愿运动动员了相当的群众，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和普及了宪政思想，从而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请愿运动的进展，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态度暴露无遗。立宪派开始谋求“推倒政府”，有的转向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